

翟理斯汉语口语教材述论

——以《汉语无师自通》(1872)为中心

李长浩, 方环海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102)

[摘要] 以英国汉学家翟理斯 1872 年出版的汉语口语教材《汉语无师自通》^①为中心, 通过对该教材语音、口语教学和日常句式等方面的分析, 揭示其在翟理斯汉语教材中的重要性。同时, 将其与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进行比较, 发现该教材具有标音体系简单、省略声调以降低学习难度、语法精简、具有针对性等特点。该教材所表现出来的编写原则和教学方法对当下国际汉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翟理斯; 《汉语无师自通》; 国际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 1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1-0116-07

一、引言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为英国前驻华外交官、19 世纪著名汉学家, 是继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之后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因翟理斯高超的汉语水平和对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 人们将其誉为英国早期汉学的“三大星座”之一。^[1] 翟理斯汉学修养颇深、成果丰硕, 一生著述众多。其汉学著作大体可以分为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杂论四大类, 影响较大的有《华英字典》(*A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1892)、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 以及英译本《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1878)。与汉语学习和研究直接相关的主要有:《汉语无师自通》(*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and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1872)、《语学举隅》(*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1873)、英译本《三字经》和《千字文》(*San Tzu Ching, Ch'ien Tzu Wen*, 1873)、《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1874)、《汕头方言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1877)、《关于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1878)、《论卫三畏博士的〈汉英拼音字典〉的某些翻译及误译》(*On Some Translat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Dr Williams' Syllabic Dictionary*, 1879)、《华英字典》、《初级汉语: 三字经》(*Elementary Chinese: San Tzu Ching*, 1900)、《百个最好的汉字: 汉字入门》(*How to Begin Chinese: 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1919) 和《百个最好的汉字 (二)》(*The 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1922) 等。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看, 《汉语无师自通》《语学举隅》《华英字典》和

[收稿日期] 2018-1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 (15BYY05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3YJAZH021)

[作者简介] 李长浩 (1993—), 男, 山东聊城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方环海 (1968—), 男, 江苏沐阳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西方汉学研究。

^① 参见 GILES. H. A.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and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M].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Printer & Stationer, 1872.

两部《百个最好的汉字》对当时西人汉语学习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翟理斯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就是他来华仅五年后编撰的汉语学习小册子《汉语无师自通》(以下简称《自通》)。作为翟理斯第一部汉语口语学习教材,这是他为实现“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作出贡献”^{[2]254}的人生抱负而进行的努力。该教材也因简单、实用、经济,赢得了许多希望在短期内掌握汉语会话的西方人的青睐并多次再版。

作为一部简易的汉语口语学习教材,《自通》的流行对19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发挥过积极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该教材的研究有所关注,其中潘伟斌介绍了该书各个部分的内容,并通过对语音、词汇、语法、句型的研究,总结出“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的原因。^[3]殷静静提出了该书的“句子本位”问题,认为《自通》并非从句法成分出发,而是直接从实用的汉语句子入手,分析了该书的注音、词汇、语法等。^[4]目前学界这些已有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在英国汉学发展历程中,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①(*Yü Yen Tzŭ ě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1867)也具有极其突出的地位,不仅对欧洲汉学,就是对东亚汉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笔者拟通过对《自通》进行分析,将其与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进行比较,以进一步凸显翟理斯该教材的特点及其在国际汉学中的地位,表现其对当时西人汉语学习的促进作用,以期对国际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个案分析与研究借鉴。

二、《自通》在翟理斯汉语教材中的重要性

《自通》是一部非常简易的汉语教材,从结构安排、内容设置上可见一斑。该教材第一版仅有60页,整体分为四部分:数字、课文、语法、词汇。课文是教材的主要内容,多为日常对话的

句子,根据主题分了十四课,每课约32个句子,内容如下:第一、二课,观光^②(The Tourist);第三、四课,商贸(The Merchant);第五、十二、十四课,日常对话(General);第六、七、八课,家务(The Housewife);第九、十三课,运动(The Sportsman);第十课,购物(In the shop);第十一课,水运(The Sailor)。除前五课外,其余课文仅有英语及汉语注音,缺少对应汉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自通》是面向口语交流的而非汉语的读写。课文之前还有数字(The Numerals)部分,共列举了31个不同数字,并给出了注音与汉字。课文之后的语法部分则非常简略。教材最后附有一份词汇表,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第一栏英语,第二栏为对应的汉语注音,共635个词条。作为翟理斯的第一部汉语教材,《自通》的编写目的是帮助来华西人在短期内掌握基本的汉语日常会话,从这一点来说,《自通》有其特点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开创简易英语拼音系统

笔者认为,《自通》最大的特点是采用简单的英语为汉语词汇、短语、句子注音。如“行李都装在船上没有?”(Is my baggage stowed away on boards?)这一句相应的注音为“Shing - lee to jwong - dzi ch' wahn - shahng mayo?”这类读音与汉语本身的发音差异并不大,而且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可以很轻松地表达出来。然而,翟理斯的注音方式并非是随意的,而是严格按照英语的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2]212}虽然已经有研究者对翟理斯的简易英语拼音系统作了归纳,如潘伟斌的文章^{[3]117},但笔者仔细研读教材后发现,潘文对注音系统辅音、单元音和复合元音的整理并不全面,未充分表现出《自通》“一音多号”的情况。如上所述,翟理斯系统是以英语的发音规则为汉语注音的,因此,系统中“一音多号”情况应该还是比较普遍的。在声母方面,如,对[ts^h]的标注,除“ts'”外,翟理斯还采用了“s”,例“soo 蔬”,但潘文并未列出。韵母方面,单元音的差异最为突出,潘文将

① 威妥玛. 语言自述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M]. 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 教材内每一课的标题都为英文,文中汉语标题为笔者所译。

其归纳为“一音一号”，而笔者通过整理注音发现几乎所有单元音都存在“一音多号”的情况，复合韵母也存在此类情况。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重新归纳了该系统的声、韵母，列表 1 表 2 如下：

表 1 《自通》声母系统 (含零声母)

现代汉语拼音声母	《自通》声母
b	p
p	p'
m	m
f	f
d	t
t	t'
n	n
l	l
g	k
k	k'
h	h
j	ch/j
q	ch'
x	sh/s
z	dz
c	ts' /s
s	s
zh	ch/j
ch	ch'
sh	sh/s
r	r
Ø	y
Ø	w

据表 1 可知，现代汉语的声、韵母在翟理斯注音系统中基本都有对应形式，但韵母 ueng 却没有对应的英语注音，笔者依据翟理斯拼音系统，推断出该复合韵母的注音可能为 ooung。对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来说，该教材开创了采用简单的英语为汉语注音的先河，在后来的部分教

表 2 《自通》韵母系统

现代汉语拼音韵母	《自通》韵母
a	ah
o	aw/oa/o
e	aw/ay/a/e
i	a/ee/irp/y
u	oo/w
ü	ü/een
er	er/ur
ai	i
ei	a/ay
ao	o/ow
ou	o/oa/ow
an	ah/ahn/en
en	en/un/um
ang	ah/ahng/ang
eng	ung
ong	o/oong/ung
ia	eah/eeah
ie	eay/eeay
iao	ayow/eeow
iou	ahn/ayo/ eeoo/e - o/ew
ian	ayenn/e - en/e - enn/en/en - enn
in	een
iang	ayang/eeang
ing	ing
iong	yoong
ua	wah
uo	aw/o/oa/waw/wo
uai	wi
uei	ooey/ooy/way/wey
uan	ooahn/wahn
uen	oon
uang	wahng/wong
ueng	—
üe	eay/üay
üan	üahn
ün	ün

材中,翟理斯也采用了同样的注音。1874年出版的《字学举隅》对要辨析的1316个汉字采用了该英语注音;1877年出版的《汕头方言手册》在编写风格上与《自通》极为相似,区别仅在于前者用英语为汕头方言注音,而非汉语官话口语。1919年,翟理斯的《百个最好的汉字》出版,与《自通》相比,前者采用了其《华英字典》中的“威妥玛-翟理斯”注音方案。这样看来,相较于“威-翟”方案而言,虽然《自通》的注音体系过于简略和不够严谨,但不可否认的是,“威-翟”方案的最终形成与翟理斯结合了《自通》的拼音系统对威妥玛注音进行修订和完善有直接的关系。^[5]

从第二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学习者使用母语对目的语中不易拼读和记忆的词句进行标注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如中国学生在学习如“psychological”这一类发音与组合较复杂的英语单词时,就可以选择汉语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其读音。我们也看到,翟理斯所采用的简单英语注音法,严格来讲并非一种科学方法,但对母语为英语且初次来华的西人来说,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学习方式,这些商人、船员、外交官等学习者无需了解汉语的发音规则,也不必掌握纷繁的部首与庞杂的汉字就可以在短期内学会基本的日常会话,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习负担。这一优势应主要归结为翟理斯从母语角度出发所制定的简单英语注音。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音是汉语学习者学习初期最早接触的内容,作为日常交流中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语音具有第一性的特征。《自通》的简单英语注音系统,为帮助汉语学习者较为准确地发音提供了一条口语“捷径”,不失为一种简单且有效的学习方式,更符合快速有效地促进西人与中国人日常交流对话的初衷。

(二) 注重汉语口语与日常句式教学

16世纪末,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传播教义,早期传教士普遍采取了“适应策略”,开始将汉语读写作为在华的主要任务之一,以期著书立说劝服中国人皈依上帝。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西方传教士、商

人、外交官进入中国,出于自身职业或事业的需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民众、政府打交道,“实用”成为学习汉语的第一要义,由此,汉语官话口语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了传教士和汉学家们的重视。纵观这一部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汉语教材,笔者发现,《自通》所收集的例句皆为日常生活的句子,并且句式简单、短小精悍、口语化程度高,如第7课“家务”中的例句:2. Tee - pahn yow shee - e - shee (地板要洗一洗)^①; 3. Chawdza yow ts' ah - e - ts' ah (桌子要擦一擦); 6. Shen yow shwah - e - shawh (先要刷一刷); 26. Nah wi - t' o, tolo tolo (拿外头,抖搂,抖搂)。通过对教材句型、句类的整理研究,可以发现翟理斯非常重视汉语口语和日常句式教学。全书除了作为主体的课文日常口语句式以外,还附录了包含大量日常口语词汇的词汇表,其目的是在学习者掌握基本句式的前提下,能够将表中的词汇套用于不同的句式,进而能够表达更加丰富、具体的日常话语,最终达到与中国人进行口语交流的目的。

笔者发现,翟理斯的另一部畅销教材《百个最好的汉字》英文书名有“How to Begin Chinese”字样,这也说明与《自通》一样,两者都是适于汉语初学者的教材。但“比较该书与《中文无师自通》的差异,后者是为了提高汉语口语,前者是为了教授汉语书面语,主要是百个汉字”。^[6]翟理斯在众多汉语教材中对口语、书面语都有介绍和研究。作为一部简易的口语教材,《自通》在西人汉语口语教学中无疑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虽然1873年出版的《语学举隅》也体现了同样的教学思想,但是从其书名和内容看,“与其说它是一本习语词典,还不如说是一本汉语官话口语的动词用法词典或搭配词典”^[7]更合适。

三、《自通》与威妥玛《语言自述集》的比较

19世纪是西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针对汉语学习与教学的研究获得了

① 该部分数字为教材中句子前的序号,括号内的汉字为笔者对照注音所补。

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汉学家和汉语研究著作。此时的英国汉学也呈现出了较为繁荣的局面,并进入了“专业汉学”期。威妥玛是与翟理斯处于同期的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剑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在汉语研究上成就卓著,也曾编写了一部影响广泛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述集》。无论是在汉语水平上,还是在促进西人汉语学习上,都堪称19世纪汉语研究和教学方面的代表。《自通》和《语言自述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汉语教材异常短缺的状况,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西人汉语学习的进程。此外,两人的在华经历、汉语学习与研究历程也较为相似。因此,在这一部分中,笔者主要以《语言自述集》为对象,通过两者的比较来论述《自通》所体现的汉语教学特点和在同期英国汉学中的价值。

(一) 相对简单的标音体系

从上文分析中,已经知道翟理斯采用了简单的英语为汉语注音,并未像威妥玛一样在《语言自述集》中归纳出了具体的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对《自通》拼音系统声、韵母的整理,发现翟理斯对汉语声母的描述还是比较接近威妥玛方案的(见表3)。

从表3可知,除x、z、r这三个声母的标注完全不同外,其余声母的注音与威妥玛方案或完全一致或部分一致,差异并不大。1867年翟理斯入华,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曾以使馆规定的《语言自述集》作为学习教材。因此,上述声母注音的相似与翟理斯曾系统学习、研究过《语言自述集》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对《自通》的韵母分析发现,翟理斯未借鉴威妥玛的注音,而是从英语母语者出发,试图用简单的英语为汉语韵母注音。如,他以字母“i”标注韵母“ai”,而“i”的音标之一即为[ai],与该韵母发音基本一致。相比而言,为达到精准发音的目的,威妥玛采用了英法意等不同语言来描述汉语元辅音的发音;但是他未能充分考虑到汉语的语音特点和英语母语者的需求,运用了许多附加符号,易使学习者产生混淆。因此,对汉语初学者来说,《语言自述集》的学习难度偏大,《自通》反而更符合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学习的需要。

表3 威、翟注音声母对照表(含零声母)

现代汉语拼音声母	威妥玛注音声母	翟理斯注音声母
b	p	p
p	p'	p'
m	m	m
f	f	f
d	t	t
t	t'	t'
n	n	n
l	l	l
g	k	k
k	k'	k'
h	h	h
j	ch	ch/j
q	ch'	ch'
x	hs	sh/s
z	ts/tz	dz
c	ts' /tz'	ts' /s
s	s/ss	s
zh	ch	ch/j
ch	ch'	ch'
sh	sh	sh/s
r	j	r
∅	y	y
∅	w	w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语言自述集》主要采用了以奥伦多夫(H. G. Ollendoff)为代表的语法翻译法,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法规则,教学方式为母语与目的语的互译。翟理斯并不赞同这种做法,相反,他切实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学习者的实际需求、汉语水平来编写教材、安排教学内容。可以说翟理斯以简单的英语记录汉语发音,一方面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也符合汉语口语自学速成教材的定位。在19世纪众多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较为复杂的汉语教材中,例如萨默斯(James Summers, 1828—1891)《汉

语手册》(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3)等,《自通》应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真正专心致力于提高学习者汉语实际对话和交际能力的简易教材。此外,翟理斯也强调了汉语送气符号的重要性,指出其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威妥玛方案易忽视送气符号而导致发音混乱的不足。

(二) 有意省略声调,降低学习难度

在早期西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学习汉语中声调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表示赞同,有人则持反对意见。通读《自通》,我们发现书中未有任何声调符号。反观《语言自述集》,威妥玛据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将声调分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并于每一音节的右上角以数字“1、2、3、4”分别进行了标注。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不免使汉语学习者和研究者产生疑惑,为何翟理斯在系统学习了《语言自述集》之后,依然没有在注音中表现汉语声调的地位和重要性呢?

在《自通》刚出版时,在华西人就对该教材的声调问题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翟理斯也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声调问题。他认为:忽视汉语声调可能使意义的表达或理解出错,并举例说明了汉语声调的重要性,如,客人在店里说自己想要吃“糖”,店小二却端上一碗“汤”,因此,声调不同,就会使对方产生误解。^{[3]117}可见,翟理斯本人也是重视声调的。但是,当时《语言自述集》的影响如此广泛,而同期的《自通》竟然完全“忽视”了前辈的研究成果,未标声调,确实令人不解。笔者认为,《自通》没有标注声调,估计是因为该教材被定位为汉语口语学习速成性教材,相对于《语言自述集》内容的丰富性而言,前者若导入声调反而会增加学习的负担,违背了在短期内培养学习者尽快掌握汉语基本口语会话的初衷。在笔者看来,《自通》的简单英语注音对课文句子的语音标注是比较准确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通过拼读以英文组合的汉语音节就可以表达出希望表达的内容,对方也能够理解其意义。即使说话人存在发音不准确或洋腔洋调的情况,对方依然可以根据场景进行猜测,进而理解其意义。因此,声调的作用并非特别明显或重要,是可以被省略的。

(三) 语法精简,有意淡化

与大多数汉语教材相比,《自通》的语法部分无疑是极其简略的,只有一页的篇幅。翟理斯指出了三个语法现象:(1)汉语名词、形容词无词尾变化:同一词语既可以作单数,也能代表复数;(2)介绍了汉语代词,指出英语主格、宾格、属格、所有格在汉语中为同一形式;(3)汉语动词在所有的语气、时态、数和人称变化中都保持不变,但过去式除外,通常表现为在动词后加“了”“着”“过”。《语言自述集》则专辟了一章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概念、术语引入到汉语语法研究中。虽然《自通》的汉语语法部分内容极少,但却指出了最精简的部分。可以说在促进汉语初学者自学口语、在短期内掌握日常会话表达方面,复杂的语法规则并不符合《自通》简易、自学的要求,而语法精简则体现了翟理斯希望学习者不因过度关注语法问题而影响日常交际会话学习的深刻关切。正因为该教材更强调实用性而不追求学术性等特点,所以备受来华西人的青睐,截止1922年已经发行了10版之多。

(四) 教材编写更具针对性

刘珣曾将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概括为五点: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性、系统性^[8],基本已经成为了对外汉语教学界普遍认同的教材编写原则。所谓“针对性”,就是指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要考虑到使用者的特点,包括其二语水平、文化程度、国别、年龄等因素。作为一部专业的教材,《语言自述集》具有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及趣味性的特点,影响广泛,曾远及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但对于希望尽快掌握汉语口语的初学者来说,《自通》比前者更具有针对性。从《自通》采用的简单英语注音即可看出,该教材是面向英语为母语且初次来华的西方人的;从课文标题和内容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西人初学者以外交官、商人、水手等为主体。因此,在针对性这一原则上,该教材充分考虑到了汉语初学者和自学者的汉语水平、学习初衷与学习需求以及他们初学汉语时的畏难心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自通》可以看作一部针对英语母语者的简易版国别化教材,尽管该教材在内容上比较简略,但它在英国汉语国别化教材编写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四、结 语

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说,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深入挖掘早期西人对汉语和汉语学习的认识与研究,对促进当下对外汉语教学的健康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9]翟理斯的《汉语无事自通》,顾名思义就是学习者可以借此自学汉语的教材,而该教材的编写就是从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出发,采用了简便快捷的方式拼写、教授汉语,虽有不足,但仍对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有一定借鉴价值。从课文的不同主题来看,教材有针对商人、船员、运动员等不同职业人员的教学内容,为了使汉语更好地应用于二语学习者的生活和工作,在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重视根据学习者的不同专业或行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即面向不同的工作人群教授不同内容的汉语,培养可以从事特定专业的汉语人才,从而避免单一且毫无方向的纯粹性教学,这或许是新世纪国际汉语教学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只有将国际汉语教学与学习者的未来工作、生活结合起来,本学科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汉语才能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通用语言。

- [1] 李真. 英国早期汉学的“三大星座”——小记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德庇时和翟理斯[J]. 人文丛刊, 第四辑: 346-353.
- [2] 王绍祥. 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 [3] 潘伟斌. 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翟理斯《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研究[J]. 语文学刊(教育版), 2009(4): 116-118.
- [4] 殷静静. 近代英国来华外交官汉语教材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 [5] 卞浩宇. 晚清英国来华外交官与近代对外汉语教学——以威妥玛、翟理斯为中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4, 12(6): 75-82.
- [6] 诸葛月新. 翟理斯《百个最好的汉字》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 [7] 龚海燕. 翟理斯《语学举隅》初探[C]//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5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96-202.
- [8]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313-318.
- [9] 张西平. 应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J]. 国际汉学, 2003(2): 273-287.

The Commentary of Giles's Spoken Chinese Textbook ——Based on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1872)

LI Chang-hao, FANG Huan-hai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spoken Chinese textbook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sinologist Giles in 1872.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phonetics, spoken Chinese teaching and daily sentence of the textbook, the paper shows its importance in the Giles's Chinese textbook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it with Wade's Yü Yen Tzū erh Chi, the paper finds that it has the features of simple phonetic system, omission of tone to reduce learning difficulties, simplified grammar and pertinence. The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textbook have certain inspiration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 of Other Language (TCSOL).

Key words: Herbert Allen Giles;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TCSOL

(责任编辑 林 芎)